

清初满洲社会所见汉籍与文化政策

庄声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明末清初的女真社会包容多元文化,尤其极为重视汉文化,为治理政权和教育子弟广泛搜集各种典籍,诸如儒家经典、兵家圣典、佛典等。皇太极继位以后颁布了八旗子弟必须接受教育的法令,但官员对子弟的教育极为消极。为了彻底改变教育现状,臣下相继奏言要求整顿师资力量。随着后金势力范围的扩大和人才的充实,新文化势力进而承担了多元文化知识的传授。清朝入关前在满洲社会极力推行的文化政策,无疑是有清一代政权长久稳定发展的根基。

[关键词] 满洲社会;汉文典籍;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991(2023)01-0049-12

一、绪言

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令额尔德尼巴克什(满文baksi,博士之意)等人以回鹘式蒙古文字创制了满文,即后来学界统称的“老满文”。由于初创的老满文与蒙古文字相差无异,无法确切记述满语语音和拼写借词,因此在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令达海巴克什对老满文进行改革,改革规范后的文字即后来学界统称的“新满文”。在这期间,达海主要担任文官职务,处理各类文书事务。^{①④②}

额尔德尼和达海为清初文化事业和文化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满文原档》记载:“额尔德尼巴克什,出身于哈达部,20岁时投靠努尔哈赤,当时留任书院(bitheijurgan)工作,而后又提拔升任为副将职务。”^①额尔德尼不仅擅长蒙古文还精通汉文,因此他被授予“巴克什”。努尔哈赤令其与噶盖扎尔固齐(gagaijarguci)参照蒙古文字创制了满文,自此开创了用满文记录编年体史书的形式。天命八年(1623),努尔哈赤以偷盗珍珠为由将额尔德尼夫妻处死,并因其他罪名将噶盖扎尔固齐处死^②。虽然

①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3册,冬字档,天命八年五月,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年,第440页;关于额尔德尼巴克什传记,满文本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236《儒林传》,东京:东洋文库藏,第11页b-13页b;汉文本参见(清)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主点:《八旗通志初集》卷236《儒林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327-5328页。

②满文本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43《噶盖传》,第24页a-25页a;汉文本参见(清)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主点:《八旗通志初集》卷143《噶盖传》,第3732页。

[收稿日期]2022-1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332)

[作者简介]庄声(1970-),男,锡伯族,新疆伊犁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清代文化史,环境农业史,历史地理,满文文献。

两人在女真文化开创期贡献卓越,但遗憾的是均被处死。改革老满文为新满文的达海,其命运与额尔德尼截然相反。天命五年(1620),达海被查出与侍女通奸,因此众人当即审议要对其执行死刑,但当时努尔哈赤认为身边除了达海无人精通汉语文,因此下令将其特赦^①,才华出众的达海幸而免死,与额尔德尼的命运大相径庭。

皇太极继位以后对额尔德尼和达海的上述事件做了如下评价:“达海虽被革职,因其有才而被复职为大臣,然而额尔德尼‘agu’无法言之,惜哉!”^②其中,“agu”有两种意义,即为先生和兄长之意,两者均表示尊敬。可见,皇太极对被处死的额尔德尼感到非常惋惜,实因为他对创制满文功不可没。与他相比达海虽然也因犯错而被革职,但因为有才又被复职重用。事实上,达海复职以后在天聪六年就因病去世,年仅38岁。皇太极因达海的英年早逝悲痛万分,对他所做的文化事业做了一番回顾^③。两位巴克什作为女真人,都是满洲文化的传播者^④,皇太极均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评价。达海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学习汉文化,一生为汉文典籍翻译事业贡献最大,他所翻译的作品包括儒家经典、兵家圣典和佛教经典。这些译作对入关后满语文的发展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皇帝在满文《黄石公素书》(hūwang šī gung ni su šu bithe)跋文云:“在世耆老告与朕,《素书》乃是我国达海巴克什在盛京时开始翻译,所翻译之言语忠实,意义深微,道义结合汉文适中得之,习者皆当成语为之效法,故不可随意修改,伊等以此为矩习之也。”^⑤康熙皇帝通过耆老得知《素书》是达海在国初翻译之作品,特别是被译成满语文的词汇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关注,强烈建议将其作为子弟学习满语文的模板,并要求不得随意更改。虽然达海的译作在当时已存世将近一个世纪,但其创作的语言对满语文的发展仍有影响。康熙皇帝赐封达海谥号,又提拔其后人^⑥。达海是入关前女真文人中传播多元文化的开拓者和引导者,深受族人的尊敬和敬仰。^[211-14]在入关前的文人当中,达海是唯一获得如此殊荣的学者,可见他具有非凡的影响力。

有关清入关前的文化传播,和田清曾经指出:“努尔哈赤时期身边仅有一位汉文顾问。”^⑦李光涛

①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1册,昃字档,天命五年三月,第328-329页;[日]神田信夫等訳注:《满文老档》I太祖1,東京:東洋文庫,1955-1963年,第214-216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33-134页。

②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8册,地字档,天聪六年七月,第222-224页;[日]神田信夫等訳注:《满文老档》V太宗2,第824-826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第1322-1323页。

③本文对族群的称呼,在天聪九年改满洲前称女真,此后称满洲。关于女真改满洲的研究,参见庄声:《锡伯超默里根问题考辨》,沈卫荣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7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27-442页;庄声:《帝国を創った言語政策:ダイチン・グルン初期の言語政策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6年,第27-53页。

④《黄石公素书》(hūwang šī gung ni su šu bithe),東京:東洋文庫蔵。

⑤“内秘书院学士禅布奏,伊祖达海巴克式,蒙赐谥文成,请立石碑,以光永久。得旨,达海巴克式,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添圈点,俾得分明。又照汉字,增造字样,于今赖之。念其效力年久,著有劳绩,著追立石碑”。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9,康熙八年五月己亥条,《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395页。“上问大学士等曰:‘达海巴克什有子孙登仕籍者否’,大学士明珠奏曰:‘闻有一孙,见为鸿胪寺官,其余不知。’上曰:‘达海始作满书,大有裨于文治,其子孙理应录用,尔等询明来奏。’寻吏部将达海巴克什亲孙参陈布禄等十二人引见,得旨,陈布禄著以刑部郎中用”。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06,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条,《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81页。另外达海碑文拓本,参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2页;《东洋文库所藏中国石刻拓本目录》达海碑(汉满蒙文),达海巴克什碑(汉满文),第111页。

⑥[日]和田清:《清の太祖の顧問龔正陸》,《東洋学報》,1952年第35期,第40-49页;[日]和田清:《東亜史研究滿洲篇》,東京:東洋文庫,1955年,第637-649页。

也曾认为：“诸申人因无书可读，所以向朝鲜索要书籍。”^①以上两位学者分别对清入关前汉文化的传授，以及传播文化的载体书籍之重要性做了初步的论述。两位学者提及的问题与初期巴克什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本文将围绕清入关前的文化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二、搜集汉文典籍

入关前的女真政权积极吸纳汉人有识之士，为初期政权的完善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譬如，天聪六年十一月书房秀才杨方兴^②奏云：“编修国史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廷，身虽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代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紧要之事。我金国虽有榜什在书房中，日记皆系金字而无汉字。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辽、金、元三史见在书房中，具是汉字汉文。皇上何不仿而行之，乞选实学博览之儒公，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千万世后，知先汗创业之艰难，皇上续统之劳苦，凡仁心善政，一开卷朗然，谁敢埋没也。伏乞圣裁。”^③汉人文臣杨方兴谈及了编纂实录的重要性，该提议促使了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编纂《太祖实录图》。^{[3]322}金国榜什，即指后金国文人巴克什。日记则是指编年体本的无圈点满文档册，即出版的《满文原档》。杨方兴认为该档册不能只以金字（即满文）书写，还应用汉字记载，并提议效仿辽、金、元三史编写后金国史。通过杨方兴的奏文，我们得知后金藏有汉文《辽史》《金史》《元史》等史书。后金创建初期为了加强军事力量，积极笼络各方势力并广求人才，同时也不忘搜集各类文献典籍，为政权的建设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了上千年的中国历史，对后世史书的编纂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类的史书不仅在中原王朝世代相传，同样给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清入关前的史料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以口述的方式，记载了相当丰富的中国上千年的兴亡史，其内容可追溯到三皇至明朝初期，历史人物达五十余位。努尔哈赤不仅口述中国历史，而且他还有收藏各类文书的习惯。据《满文原档》记载天命八年，汗览昔永乐帝诰命之敕书曰：“此敕书之言皆善，顾他人之手，受他人之恩而生，岂可让凶暴滋生，汗举而养之，然不思恭敬汗，轻视者败亡者其也。将此书收藏，善言之语也。”该敕书曰：“奉天承运汗曰：‘朕思之，因汗者治国治天下为一家，治大军民安，不分远近皆置官统领也。尔朗布尔罕（满文：langburhan）虽驻边地，为大义而归附，知天时晓事理者。尔心深远，故挑选众人之上举，朕晓尔之忠义，喜慰之际岂有不加赏赉乎。原授尔为毛怜卫指挥使衙门之指挥佥事之职，今特加为怀远将军，进本卫，世代相传指挥同知也。尔需倍加谨守大义，好生勤敬，加紧约束尔之所辖兵民，固守边地使之安定，行猎养畜，任凭繁衍万物，始

①李光涛：《老满文史料》，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第5页；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满文教育与译书事业》，王成勉主编：《明清文化新论》，天津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稻乡出版社，2002年，第57页。满语 jušen，通常汉文写为女真或诸申。

②“杨方兴，字淳然，汉军镶白旗人。初为广宁诸生。天命七年，太祖取广宁，方兴来归。太宗命直内院，与修太祖实录。崇德元年，试中举人，授牛录额真衔，擢内秘书院学士。性嗜酒，尝醉后犯跸，论死，上贯之，命断酒。顺治元年，从入关。七月，授河道总督”。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279《杨方兴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0109页。

③《奏疏稿》，天聪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复制本。关于《奏疏稿》研究，参见[日]中身立夫：《日本の東洋史学黎明期における史料への探求》，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会編：《清朝と東アジア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第97-126页；[日]中身立夫：《〈盛京宮殿旧藏汉文旧档〉和所谓〈喀喇沁本蒙古源流〉》，冯明珠主编：《文献与史学：恭贺陈捷先教授七十嵩寿论文集》，远流出版社，2002年，第414-432页。

终无恶而生,则上天眷顾,尔之子孙世代必享福贵,勿轻视朕之谕。”^①朗布尔罕(langburhan),乾隆年重抄本《满文老档》误作“lingburhan”。此人为明代毛怜卫女真人,永乐十四年(1416)被授予指挥千户职^②,天顺三年(1459)被朝鲜诱害致死^③。明朝史料作“郎卜儿哈”“郎卜儿罕”,朝鲜史料作“郎卜儿看”“郎卜哈儿罕”“浪孛儿罕”等。朗布尔罕因忠于明朝,又深明大义,因此永乐皇帝在毛怜卫指挥佥事的职位上又加封其为怀远将军,并世代相传指挥同知之职。由此可见,在明朝永乐年授予朗布尔罕的诰命,到明末依然保留,至于如何到努尔哈赤手中就不得而知。但朗布尔罕恪尽职守、为人忠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努尔哈赤下令妥善保管此类诰命文书。

早在建州卫努尔哈赤时期,女真人到北京朝贡时就搜集各种典籍。万历二十六年(1598),朝鲜使臣李恒福描述:“燕京有卖书人王姓者,每朝鲜使臣到馆,必出入卖。……吾等一行留会同馆五十余日,朝贡达子六百余名,亦留北馆,与吾等一行下人,颜情稔熟。……后数日到通州,有卖书人来过,仍言近来达子朝贡,过此者极求书册,尤好医卜等书云。”^④所谓经过通州朝贡“达子”,即指女真人。女真人来到京城或通州地区,除游山玩水外,还热衷购买书籍,尤其喜好医学和占卜等典籍。

明代女真人收藏典籍可以追溯至15世纪,当时除了收藏《元世祖实录》以外,明代女真人对相关佛典等典籍也多有收藏^⑤。据《满文原档》记载,我们知道努尔哈赤经常引用佛典^⑥用语作为训导语言,教诲臣下的场面屡次出现,这是否也与女真人的传统家训有关呢?此外,据《柵中日记》记载:“(庚申)年三月二十日,《朝闻录》成。上年九月间,大海将《性理群书》《二程全书》《名臣言行录》《皇华集》共三十余卷,送于柵中。盖其书乃我国所印。而东征之役,为天将所取去。铁岭之破,流入胡中者也。拘縶巾,日夜诵读,以之消遣。但其书皆断慢不秩,不能参考首尾。遂筭其格言至论而录之,凡三卷,名之曰《朝闻录》。”^⑦《柵中日记》是萨尔浒战役中被俘的朝鲜人李民窳在被俘期间撰写

①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4册,盈字档,天命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第93-95页;[日]神田信夫等訳注:《满文老档》Ⅱ太祖2,第856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第551页。

②《明太宗实录》卷172,永乐十四年正月癸丑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910页。另参见河内良弘:《建州女直の移動問題》,《東洋史研究》第19卷第2号,1960年,第86-155页。

③《朝鲜王朝世祖实录》卷17,世祖五年九月壬寅条,《朝鲜王朝实录》第7册,国史编纂委员会,1970年,第349页;《朝鲜王朝世祖实录》卷19,世祖六年一月己丑条,《朝鲜王朝实录》第7册,第363页;《明英宗实录》卷314,天顺四年四月甲戌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6581-6582页。

④[朝鲜王朝]李恒福:《朝天记闻》,[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8,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7-458页。关于会同馆的研究,参见[日]松浦章:《明清時代北京の会同館》,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会編:《清朝と東アジア: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第359-380页。

⑤“传于礼曹曰:‘童清礼家藏《蒙古世祖皇帝》册一、《知风雨》册一、《善恶报应》册一、《南无报大》册一、《阴阳占卜》册一、《福德智慧》册一、《饮食燕享》册一、《日月光明》册一、《阴阳择日》册二、《开天文》册一、《真言》册一、《佛经》册七、《礼度》册一、《劝学》册一等’,其付司译院传习”。参见《朝鲜王朝成宗实录》卷98,成宗九年十一月丙寅条,《朝鲜王朝实录》第9册,国史编纂委员会,1970年,第662页。另参见[日]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40页;[日]河内良弘:《燕山時代の朝鮮と女真》,《朝鮮学報》,1976年第81期,第75-91页。

⑥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1册,荒字档,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第62页;[日]神田信夫等訳注:《满文老档》Ⅰ太祖1,第567页。

⑦[朝鲜王朝]李民窳:《柵中日记》,《韩国文集丛刊》第8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115-130页;关于《皇华集》,明代姜绍书的《韵石斋笔谈》卷上记载,“丹阳,朝鲜人好书,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直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也。余曾见朝鲜所刻《皇华集》,乃中朝册封使臣与彼国文臣唱和之什,镂板精整,且茧纸莹洁如玉,海邦细帙,洵足称奇。”有关《柵中日记》的研究,参见[日]今西春秋:《〈柵中日记〉天理图书馆藏今西文库本影印》,《朝鮮学報》,1972年第64期,第125-190页。

的。庚申年,即天聪三年(1629)。大海,即达海,天聪二年(1628)九月他将《性理群书》《二程全书》《名臣言行录》等三十余册朝鲜版的典籍带给了被俘的朝鲜人。这些典籍是在万历年间明朝援兵朝鲜抵御日本侵略时流入辽东的。天命四年(1619)七月二十五日,女真人攻破铁岭之后这些典籍作为战利品落入女真人手中^①。当时女真人的战利品中除了书籍以外,还包括一些重要的信函^②。^{[4]167}

除此以外,女真人出使朝鲜时也求书籍。据《各项稿簿》记载:“金国汗致书朝鲜王国,两国通好,情意周匝,未及候问,心甚阙然,敬遣英吾儿代、叉哈喇、慢打儿韩恭候兴居,兼致薄仪,少伸鄙意,伏维鉴纳外,闻贵国有金、元所译《书》《诗》等经及四书,敬求一览,惟冀慨然。”^③皇太极派遣英俄尔岱、察哈喇、满达尔汉等使臣向朝鲜国王问候,并向朝鲜索要书籍。他们索要的并非一般汉籍,而是金代或元代翻译成女真文或蒙古文的儒家经典《书经》《诗经》和四书等。朝鲜回复道:“见索《诗》《书》、四书等典籍,此意甚善。深嘉贵国尊信圣贤,慕悦礼义之盛意也。第金、元所译则曾未得见,国中所有,只是天下通行印本,虽非来书所求,而不欲虚厚望,聊将各件通共三十六册呈,似只可领情也。”^④可见,女真人的索书要求并未得到满足,朝鲜告知未曾见过此类书籍,但另外赠送了36册典籍,至于赠送的书籍究竟是何种典籍,回信中并未提及,仅知道是天下通行的印行版本。次年,即天聪三年十月,朝鲜赠送了一批朝鲜版的《春秋》《周易》《礼记》《通鉴》《史略》等典籍^⑤。虽然天聪年间女真人曾向朝鲜索要被翻译成女真文或蒙古文的典籍,但其实早在天命十一年(1626),已有《书经》内容被翻译成满文的先例^⑥。^{[4]185}因此,我们认为女真人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翻译《书经》,甚至更早就有翻译和阅读汉文典籍的迹象。除上述读物外,有关军事、地理方面的书籍也在女真人搜集的范围之内^⑦。由此可见,李光涛认为女真人无书可读的观点还有待商榷。根据入关前各种满汉文史料,女真人搜集的汉籍远远超过了上述史料中出现的典籍,如《易经》《孙子》《吴子》《文选》《尚书》《论语》《孔子集语》《韩非子》《朱子语类》《帝鉴图说》等文献内容,也是常常引用的典籍。

综上所述,女真人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典籍,但他们所搜集到的典籍基本为汉文典籍,那么母语是

①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1册,辰字档,天命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第269页;[日]神田信夫等訳注:《满文老档》I太祖1,第169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第105页。另《明神宗实录》记载:“大学士方从哲题适,接得辽东巡抚周永春塘报及巡按陈王庭揭帖,皆称七月二十五日奴贼约五六万,于寅时从三岔儿堡进入,辰时将铁岭城攻开。”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85,万历四十七年八月壬子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1181页。

②收缴的信函满文汉译为“尹游击在清水县城拾得文书云:‘毛文龙于丑年十一月上奏天启汗之文书。’”

③《各项稿簿》,天聪二年十一月初八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复制本;另参见[日]市村瓚次郎编:《各项稿簿》,《史苑》,1929年卷2、卷3。此国书也收录到《朝鲜王朝实录》中,内容略有不同。参见《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十二月庚寅条,《朝鲜王朝实录》第34册,国史编纂委员会,1970年,第308页。此国书也收入张存武、叶泉宏编《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中,但编者将人名“叉哈喇,慢打儿韩”,误作“叉哈喇慢,打儿韩”。参见张存武、叶泉宏编:《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台北“国史馆”印行,2000年,第50页。关于《各项稿簿》的研究,参见谢肇华:《关于汉文旧档〈各项稿簿〉》,《文献》,2000年第2期,第268—278页。

④参见《朝鲜国王来书簿》,天聪三年正月初七日。该内容又收入《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十二月壬辰条,《朝鲜王朝实录》第34册,第309页。又参见[日]神田信夫:《〈朝鲜国来书簿〉について》,《满族史研究通信》,1995年第5期,第9—14页。

⑤“金汗求书册,以《春秋》《周易》《礼记》《通鉴》《史略》等书赐之”。参见《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21,仁祖七年十月甲戌条,《朝鲜王朝实录》第34册,第352页。

⑥满文《书经》内容汉译为“《书经》曰:‘如行善,则天降百福。如行恶,则天降百祸。’”此《书经》原内容为“为善则降之百祥,为恶则降之百殃”。参见(宋)蔡沈:《书经集传》,世界书局,1972年。

⑦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7册,月字档,天聪四年二月初五日,第46页;[日]神田信夫等訳注:《满文老档》IV太宗1,第305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第987页。

非汉语的女真人是如何阅读这些汉文典籍的呢?下面看看宁完我^①是如何提议阅读汉文典籍。参将宁完我谨奏:“臣观《金史》乃我国始末,汗亦不可不知。但欲全全译写,十载难成,且非紧要有益之书。如要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如要益聪明知识,选拣练战攻的几权,则有《三略》《六韬》《孙吴》《素书》等书。如要知古来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此等书实为紧要大有益之书,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近来本章稀少,常耐、恩革太二人每每空闲无事,可将臣言上项诸书,令臣等选择,督令东拜、常耐等译写,不时呈进。汗宜静览深思,或有疑蔽不合之处,愿同臣等讲论庶书中之美意良法。不得轻易放过。而汗难处愁苦之事,亦不难迎刃而解矣。《金史》不必停止,仍令代写。”^②宁完我提及翻译《金史》十年也很难完成,更何况是非紧要之书。他极力推荐治理国家应当翻译阅读儒家经典、兵家圣典、编年体史书等典籍,将这些汉文典籍交给女真人常耐(也作常甯)^③、恩革太(也作恩国泰、恩格德)^④和东拜(也作敦拜)^⑤等人翻译,因此通过阅读这些翻译的经典著作,统治者在处理国政时就会得心应手。显然,当时的女真人包括皇太极都无法直接阅读汉文典籍,只有译成满文之后才能阅读和理解其意。而担任翻译重任的均是出身女真的有识之士,他们为汉文典籍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三、传播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童蒙识字教材有《急就篇》《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这些启蒙教材除在中国本土广泛使用以外,在朝鲜和日本也广为流传。其中《百家姓》为四字一句,句句押韵,全书共

①关于宁完我的履历,满文本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79《宁完我传》,第2页a-6页b;汉文本参见(清)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主点:《八旗通志初集》卷179《宁完我传》,第4298-4299页。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康熙六年闰四月三日记载,“张国栋佐领下,原任内阁大学士宁完我系辽阳人,由生员蒙太祖招贤进用,于天聪三年取永平征查哈拉,招抚大凌河有功。又于天聪五年,条奏五事,一立六部,二设言官,三更馆名,四设通政使司,五办服色,恭逢。世祖皇帝取北京后,于顺治元年十月内宁完我入阁,时蒙世祖皇帝擢用,为内阁大学士,三次会试大主考,议政内阁大臣,至顺治九年,命修理实录馆敕书开,后皇帝敕谕内阁翰林同史院大学士宁完我兹者恭修。十三年原品休致,康熙四年病故,康熙六年敕赐祭碑文并谥号”(登录号:185056-006)。关于宁完我的碑文,参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2册,第86页。

②《奏疏稿》,天聪七年七月初一日。

③“刚林弟常甯,同刚林往随睿王,潜通往来,是实。常甯应革职,解部任,鞭一百,籍其家”。参见《顺治朝满文国史档》,顺治八年闰二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83-84页。又参见《清世祖实录》卷54,顺治八年闰二月乙亥条,《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432页。

④《奏疏稿》,天聪六年九月。“翻译之笔帖式在书房之通文理者止恩国泰一人,事繁人少至稽迟。再择一二以助不逮,制立号簿,注限日期。要使大事不过五,小事不过十,分任之后,课其勤惰,察其能否;崇德三年四月,在礼部任汉文笔帖式”。参见《满文内国史院档》,崇德三年四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日]河内良弘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注·崇德二·三年分》,京都:松香堂书店,2010年,第300页。“恩格德,正蓝旗人,世居辉发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历任礼部尚书,兼佐领。其子纳海原任骁骑校。纳敏原任都统,兼佐领。孙诺敏,原任山西巡抚。纳敏原任二等护卫”。参见(清)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24,京都大学藏,第7页。“诺岷,纳喇氏,满洲正蓝旗人。先世居辉发,祖恩国泰,习汉书,天聪八年举人,直秘书院,授礼部理事官,存擢尚书。父那敏,官镶黄旗满洲都统”。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294《诺岷传》,第10343页。

⑤“敦拜,满洲正红旗人,今改隶正黄旗。姓傅察氏,世居沙济地方。父彭库里,初事太祖高皇帝时,有朱社理十三部长尤楞格,硬化不服,彭库里奉命偕鄂佛洛昂邦往剿之,奋勇着绩,恩赐苏赫巴图鲁号,创立牛录,俾管其一,后以功兼统辖牛录,既卒,敦拜以长子袭管牛录事”。满文本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48《敦拜传》,第38页a-39页a;汉文本参见(清)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主点:《八旗通志初集》卷148《敦拜传》,第3802-3804页。

142句568字,所收录的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姓氏。《千字文》是自宋代开始广为流传的一部综合性字书,到了明代它也是被秀才们所认可的一部蒙学读本。^[59]

明末清初女真人也曾将《百家姓》作为习字教材,其练习书写汉字的草稿内容恰好在《满文原档》中有所保存。根据草稿得知在明朝公文书背面用满文记录了相关内容^①,其中在空白处书写了大小形状不一的19个汉字,按字形及形状判断,这些文字应该不是利用毛笔所写,而是利用专门抄写满文的专用笔所写。在草稿的下方,有两行四字的句子,第1行为“赵钱孙李”,第2行为“周吴□王”,由此可以断定内容源自《百家姓》。草稿的右边写有6个“赵”字,但偏旁“走”写了几次都写错了,“肖”字上部多个笔画。“马”字繁体字极有可能因较难写,故省略了笔画。第2行第3字仅看清偏旁“卩”,根据《百家姓》的顺序得知为“郑”字,该4个字应该就是“周吴郑王”,对初学者而言,繁体字“鄭”字恐怕非常难写。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习字者仍未掌握汉字笔顺要领,与敦煌练字抄本《百家姓》相比较,^[61]书写者对汉字的构成原理和结构还没完全理解,推测这些汉字是入门初学者所书写(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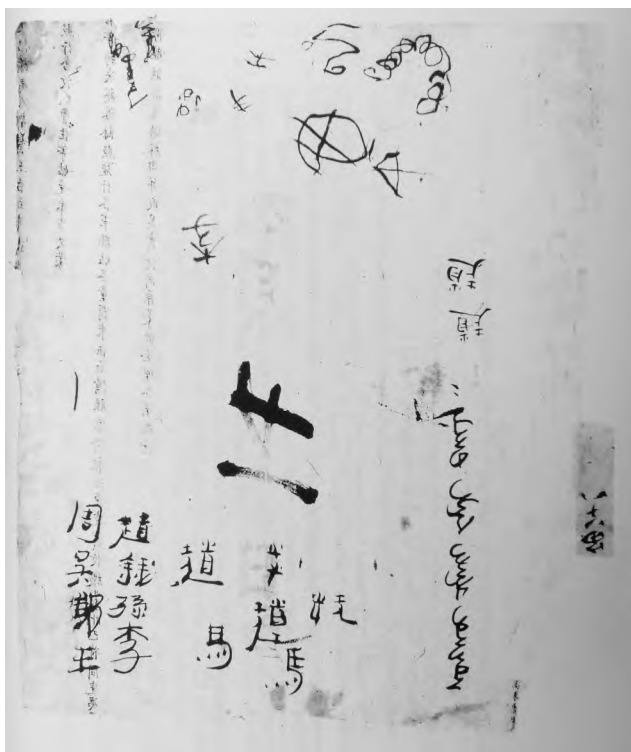


图1 《满文原档》(第5册)保存的女真人习字草稿

女真人利用童蒙字书学习汉字,应当与八旗汉人教员密切相关。《满文原档》记载:“八旗教书之汉人外郎,每人赐银三两。”^②可见,入关前女真人以怀柔政策重用汉人文人,并让他们在八旗内教授

① 关于入关前诸申人利用明朝公文书记录档案的研究,参见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旧满洲档》第1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第8页;[日]松村潤:《天命朝の奏疏》,《日本大学史学科五十周年記念歴史学論文集》,東京:日本大学史学科五十周年記念事業実行委員会,1978年,第591页;[日]松村潤:《明清史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第259页;[日]細谷良夫:《〈滿文原档〉「黄字档」について——その塗改の検討》,《東洋史研究》第49卷第4期,1991年,第23页。

② 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2册,张字档,天命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第335页;[日]神田信夫等訳注:《满文老档》I 太祖1,第46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第286页。

旗人子弟读书学习。事实上,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早在努尔哈赤兴起的初期,女真人就聘用汉人传授子弟知识。“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年少客于辽东,被抢在其处,有子姓群妾,家产致万金。老乙可赤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尽通矣”^①。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南方出身的汉人少年龚正六旅居辽东,被努尔哈赤劫持到建州,给予他财富,让其教授女真子弟学习汉文化,平时称他为“师傅”。此外,又据朝鲜使臣李恒福记载:“是夕,余适往江上等商舶散闷,有前日留馆达子数人来见译官等,欣慰。殊甚与语款款。言及虏中之事,具言辽阳有士人黄姓者,自少以能文知名,被掳在胡中,称为黄郎中。胡人呼文士为郎中。今方以贡胡来此,虏颇敬之。资产极丰。常书,美姬四人,牛马弥山云。”^②据朝鲜使臣李恒福所记,我们得知当时除了上述龚正六以外,黄姓辽阳人士“郎中”与龚正六同样享有诸多家产,极有可能也被某贝勒聘用,教授子弟读书学习汉文化。除来自中国本土的汉人文人外,朝鲜投靠来的文人也有很多。朝鲜使臣黄忠一在《银槎录》中记载:“老乙阿赤向我国谓何曰?渠常说称:‘高丽。’高丽曰:‘强国如得高丽人则心极贵之。’问:‘如今部里有几个高丽人口否’,曰:‘丽人二十名,时在手下,解文能射,训海骑射之法。小儿哈赤极爱之,每人给使唤二十名,十名力农治活,十名跟护出入,少有抢掠。处则必带二十名俱去。’问:‘二十名何地何姓人’,曰:‘居住姓名我不知云。’”^③老乙阿赤即努尔哈赤,其身边有20名能文善骑射的高丽人,这些人还特别受小儿哈赤(即舒尔哈齐)的器重。由此可知,在女真人社会里除汉人文人外,朝鲜人也活跃在女真人的社会各层,并且还被女真贵族所重用。

女真社会的文人不仅局限于汉人和来自朝鲜的有识之士,女真出身的文人也同样受到重用。据《满文原档》记载:“图沙,因习汉书,汗用之,授以事例,夜宿汗家,因与汗子之乳母私通,诛之。”^④可见,具备条件的女真人也曾教授子弟读书学习,可他们一旦触犯律法必然受到严惩。这也表明努尔哈赤在女真社会里早就施行了优待文人,并为贵族子弟教授知识的政策,其中个别人参与了翻译汉文典籍事业,为多元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和田清的“努尔哈赤时期身边仅有一位汉文顾问”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总之,女真本土文人以及来自明朝或朝鲜的有识之士,能够在女真社会传授文化,得益于当时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努尔哈赤倡导的文化政策促进了各类人才的培育工作,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⑤。

①《朝鲜王朝宣祖实录》卷70,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癸卯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国史编纂委员会,1970年,第608页。熊廷弼编《按辽疏稿》,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条记载,“有杜总兵、东总来本职接至高桥界,杜总兵问本职中左营所属有几个边堡,看边属夷系那营部落。当职回云:‘共有四边堡,具系供兔营达子。问毕,到所经过,分付本职,将贵英先差来,讨赏龚学文等达子都检来……将贵英下属夷龚郎中等十三名,肘锁到衙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贵英极有可能是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因此史料中的人物龚学文或龚郎中,正是朝鲜史料中出现的龚正六(陆)。因此,和田清认为龚正六被努尔哈赤处死的观点,有待商榷。参见[日]和田清:《清の太祖の顧問龔正陸》,《東洋學報》,1952年第35期,第49页;[日]和田清:《東亞史研究滿洲篇》,第648页。

②[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8,第457-458页;另,据《明档蒙古满洲史料》记载:“崇祯七年七月,飞报夷情并捉获奸细事……本月十四日亥时盘获一行奸细三名,尚贵,即白言红,辽东宁远人。孟仓,陈学政系西马营人,随发保美处捕。彭国将,朱时勋审得。尚贵,系辽东人,被贼虏去于崇祯元年三月内有插汉下季笔写气,约每月与授工食银三两。”参见《明档蒙古满洲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编号:141-264。

③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4册,收字档,天命十年六月,第294页;[日]神田信夫等訳注:《满文老档》Ⅲ太祖3,第976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第633-634页。

④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2册,张字档,天命六年七月十一日,第147页;[日]神田信夫等訳注:《满文老档》Ⅰ太祖1,第35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第218页。关于满文对此内容的相关记载,翻译成汉文为:汗谕,十一日,命准托依、博布黑、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札海、浑岱,此八位师傅为八旗之巴克什,尔等如精心教习门下子弟通晓书文者赏功,如不勤学子弟不通晓书文者治罪。门下子弟如不勤学,尔等师傅告于贝勒,八师傅无须涉足他事。

四、教育的重要性

因考虑与周边交往,努尔哈赤赦免了精通汉语的达海死罪。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汉文化对女真人处理国政和在外交上的重要性。皇太极执政期间,在朝廷内需要精通汉语的有识之士,同时他还传谕八旗子弟普遍接受教育。天聪五年(1631)闰十一月初一日,皇太极颁布了满、汉、蒙古八旗子弟读书谕旨(图2):“我国贝子、大臣等子弟,某为父者自我推辞不愿送去读书。推辞者认为我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我兵弃滦州事,驻守永平之贝勒没去往探之故也。弃永平、遵化、迁安皆无读书、不通道义之故乎?今围困大凌河四月间,竟以食人肉死守,皆杀援兵大凌河才得手。而锦州、松山、杏山不肯弃,皆为读书晓道义,为汗效忠尽职者也。不愿将子弟读书,自我推辞不闻者,则自身不必披甲,不必行军,任凭尔之可乎?凡子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也。”^①可见,诸位官员认为读书意义不大,不积极让子弟接受教育。但皇太极认为诸位因不读书,才导致兵丁士气低落,因而影响了整个战局。因此,他颁布了8岁以上15岁以下所有八旗子弟必须接受教育的读书法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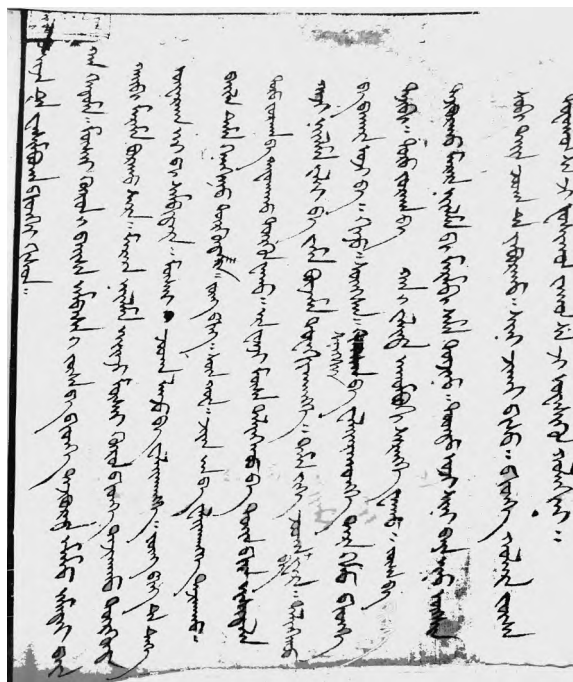


图2 《满文内国史院档》存读书法令

关于八旗子弟对教育持有消极态度的问题,汉人文臣也曾提及。譬如胡贡明奏云:“皇上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诚大有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书极好的事,反看作极苦的事,多有不乐的。若要他自己请师教子,益发不愿了,况不晓得尊礼师长之道理乎。臣之见当于八家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然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②金,即指女真。自

①《满文内国史院档》,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初一日;关孝廉译:《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历史档案》,2001年第5期,第13页;该文汉文内容收入《各项稿簿》,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又收入《大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23-24页。

②《奏疏稿》,天聪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天聪五年皇太极颁布读书令以后,八旗子弟并没有出现竞相读书的景象,反而八旗将领表现消极,颁布的读书法令并未在八旗子弟中获得积极的施行。胡贡明不仅指出了女真子弟不专心读书的实际情况,而且他还怀疑秀才的教养问题,认为只有优秀教员才能够教出优秀的学生,对此范文程^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范文程云:“臣昨见汗谕,国中子弟读书,实得图治根本。但读书一事,似易而实难,全在教师,云得人师傅善教数年,即可成材,师不善教,[#百年][+虽久]亦归无用。今八孤山虽有十数秀才教学,多不通义理,不明世务,不过借此免差避役。任令子弟嬉剧顽笑,虽有十年之名,[#并无][+未得]一日之益。是以我国至今不见通学,众见读书无益,以为[#读书][+汉文]难学,不亦误乎,不亦终乎。臣既不能摧锋陷阵,作龙骧虎跃之。臣又不能决策,实算为运筹帷幄之士,愿请皇上令臣替管八孤山子弟读书之事。师有不职,许臣奏更。学生顽惰,许臣责治。以学生进益多少,定[#教][+师]傅教学之功罪。为此二、三年学生大变,五、七年文运昌炽矣。汗既有志中原,读书实第一急务。凡百战攻之事,[#旦夕][+克日]可成。惟此读书事,就旦夕所[#可][+能]收效,不[#能][+可]不早为之计也。伏乞裁酌。速赐允行,国家幸甚。谨奏。”^②可见,该文是颁布读书令后的次日上奏文书的草稿。文中八孤山,即指八旗。范文程认为要切实贯彻执行读书令,首先要解决教师的素养问题,八旗虽然有数十位教书秀才,而且他们也教授了子弟数十年,但成效不彰。所谓的文人几乎都不通文理,要让八旗子弟读好书,优秀的教师是非常重要的,有了优秀教师才能教授出有用的人才。胡贡明和范文程的观点几乎是同出一辙。事实上,当时在八旗中有如下16位教书秀才,详见表1。

表1 八旗汉人教员

正黄旗	黄昌、舒芳	镶黄旗	董世文、孟继昌、刘泰
正红旗	吴义宁	镶红旗	陈楚贤、水英卓
正蓝旗	尤悦龙、李度	镶蓝旗	刘养性、王世选
正白旗	齐国钟、霍应选	镶白旗	董敬书、李维焕

资料来源: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8册,地字档,天聪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第253页;[日]神田信夫等訳注:《满文老档》V太宗2,第850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第1338-1339页。

通过表1可知16位教员均是在八旗教书的秀才,除镶黄旗和正红旗外,其余各旗均是两位秀才教员。早在天聪三年,女真人就开始实行了秀才选拔制度,当时通过考试录用了数位秀才。《各项稿簿》记载:“敕谕各城屯堡秀才知悉,朕思自古及今,莫不以武安邦,以文治世,两者缺一不可。朕今欲与文教尔等诸生,有怀才抱异,或各王府及金、汉、蒙古部下者,俱限本月二十三日赴钟楼前,高、殷二游击处报名,二十七日完毕,九月初一日考试,各秀才主不许阻拦。如考中者与人换出,无得自换。

①关于范文程的传记,满文本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第2页a-26页a;汉文本参见(清)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点:《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第4188-4194页;范文程的墓志,参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2册,第115页;关于范文程的研究,参见[德]W.Fuchs:Fan Wen-ch'eng 范文程,1597-1666,und Sein Diplom 誥命,日本广岛史学研究会编:《史学研究》第10卷第3期,1939年,第14-36页;[日]遠藤隆俊:《范文程とその時代——清初遼東漢人官僚の一生》,《东北大学东洋史論集》,1995年第6期,第434-458页。

②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明清档案卷·清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表示原文删除,[+]表示原文添加之处。最终,范文程与宁完我联名上奏,文书收于《奏疏稿》,天聪六年正月,但在内容上做了很多修改。

特谕,天聪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每固山十张,仍贴钟楼八门。”^①可见,为巩固政权,皇太极积极吸纳有识之士,通过考试录用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按照等级又分别给予奖赏^②。另外,据《满文内国史院档》记载,致都察院之奏疏官员谕曰:“初得辽东,其辽东该杀戮者杀了二、三回,肆行该阿哈者成阿哈。如此我念良民在善者之家为阿哈者甚多,将尊贵者当庸劣阿哈差遣,慈诸王以下及民以上,良民为阿哈差遣者,皆举荐为民。又,经两三次秀才考试,将稍通文义者立即举荐为秀才。”^③初期女真人进入辽东地区,已有不少汉人投靠,这些人中有自愿成为阿哈(aha)者,也有一部分被举荐成民者,甚至有一部分人通过选才考试勉强成为秀才。初期随着女真势力的扩张,人口随之膨胀,急需各类管理人才,虽然以考试选拔了部分人才,但在所选拔的人才之中文化水平低下者还是很多。

女真人迁移到辽东以后,为了让八旗子弟很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极力推行多元文化教育。但教育的推行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八旗官兵消极对待读书法令,不仅如此,还严重缺乏优秀的教书先生,这种情况的出现均与国初盲目任用秀才有关。也许是文臣奏疏起了作用,天聪六年十月皇太极开始对秀才进行整顿,其中以超员为由被除名的秀才就上告汗曰:“教习汉文之四秀才,教授两旗子弟已有十二年矣。我等所教授之敦拜、巴敦、恩革太此三人均被部录用。新进两旗诸大臣之子弟,亦皆已教授两年矣。丑年戮诸秀才之时,蒙汗施恩,命我等教书择而养之。被戮秀才家中诸物悉赐我等。凶年赐银购粮而食。今蒙汗施恩,因教书秀才等各二男丁并被免差役,故正黄旗秀才超员,仅命董秀才、黄秀才教书,而将刘泰、舒秀才我等二人革除,充当差役。将镶黄旗新旧子弟从我处带出,镶黄旗由新进秀才教书,我等十二年教书之苦告知于汗,各二男丁被免差役。”^④

镶黄旗秀才刘泰和正黄旗秀才舒芳教授两旗子弟已有12年,教授的子弟有敦拜、巴敦、恩革太等3人被部录用在衙门行事。其中敦拜、恩革太即前小节在宁完我的奏疏中提到的建议参与翻译汉文典籍事业的女真人。敦拜和巴敦在天聪五年设置的六部衙门中,分别担任礼部和刑部的笔帖式。^[2117-118]恩革太在天聪六年任书房笔帖式,并在天聪八年(1634)的举人考试中成为满汉文举人(tukiyehe niyalma)^⑤。崇德元年(1636)五月,恩革太被选为秘书院的举人(narhūn bithei yamun i tukiyehe niyalma)^⑥。崇德三年(1638)四月,他又被任命为礼部汉文笔帖式(dorolon jurgan i nikan bithesi)^⑦。显而易见,女真人学习汉文化并在六部任职,与早期在八旗中教书的汉人教员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随着人才的充实,这些教员逐渐以各种理由被后来的新文化势力所替代,新文化势力为传播和推广多元文化做出了贡献。对重新选拔人才工作,都察院衙门官员也都认为“前科取士,部落皆换出,仁声远播”^[8]。清初从单一的民族文化逐渐向多元性发展,入关后对多元文化越来越持包容态度。

①《各项稿簿》,天聪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又收入《大清太宗实录》卷4,天聪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第15-16页。实录收录的内容与《各项稿簿》略有不同。

②《大清太宗实录》卷4,天聪三年九月初一日,第16页。

③《满文内国史院档》,崇德三年正月十五日;季永海等译:《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第22-2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67页。

④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8册,地字档,天聪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第264-265页;[日]神田信夫等译注:《满文老档》V太宗2,第860-86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第1345-1346页。

⑤《满文内国史院档》,天聪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78页。

⑥参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10册,日字档,崇德元年五月初三日,第162-163页;[日]神田信夫等译注:《满文老档》VI太宗3,第1031-1032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第1451-1452页。

⑦《满文内国史院档》,崇德三年四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290页;[日]河内弘良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注·崇德二·三年分》,第300页。

五、结 语

明末清初,努尔哈赤下令以蒙古文创制满文,并重视多元文化的发展。为了与明朝和朝鲜顺利交往,努尔哈赤赦免了精通汉语的有识之士达海。达海后来成功推行了文字改革,又以他的文化影响力在女真社会,特别是在后来的满洲社会开创了传播多元文化的先例。皇太极更是认可他的成就,入关以后的康熙皇帝同样也对其给予了最高评价。

女真人社会自古就有收藏各种典籍的传统,这些典籍为普及多元文化,也为处理国政军务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迁移辽东以后,为了让八旗子弟接受良好的教育,皇太极即位后颁布了读书法令,但因各种原因颁布的法令成效不彰。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臣下相继奏言,要求彻底整改教育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类规章制度的完善,初期采用的教书秀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继而替代的是后起之秀的新文化势力。普及教育从国初狭隘的民族文化逐渐走向多元化,入关后对多元文化越来越持包容态度,而倡导的多元文化政策,无疑是政权能够维持长久稳定发展的根基。

[参考文献]

- [1]冯明珠.满文原档:第3册[M].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
- [2]庄声.帝国を創った言語政策:ダイチン・グルン初期の言語政策と文化[M].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6.
- [3]冯明珠.满文原档:第9册[M].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
- [4]TATIANA A.PANG, GIOVANNI STARY. New light on Manchu historiography and literature: the discovery of three documents in old Manchu scrip[M].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8.
- [5]韩邦奇.苑洛集:卷19[M]//王云五.四库全书珍本四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 [6]京都国立博物館.シルクロード文字を辿って[M].京都:京都国立博物館,2009.
- [7]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8[M].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 [8]方裕瑾.清崇德三年汉文档案选编[J].历史档案,1982(2):20.

【特约编辑 孙久龙】

Chinese Works and Culture Policies Seen in Manchuria Society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ZHUANG She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Ming-early Qing Dynasties, inclusive Jurchen society was open to all kinds of cultures, especially Han culture. At that time, different kinds of works, like Confucian classics, military classics, Buddhist scripture, etc. were collected to govern the new state and educate the offspring of Jurchen. After Hong taiji took office, education policies were adopted to ask offspring of the Eight Banners to be educated. However, offspring of officers had a fairly negative attitude to the polic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standards, officers successively advice to strengthen the teachers. With the Late Jin state showing more and more power in domain and talents, new cultures accordingly accept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mparting the multicultures. Before the Qing regime entering the Shanhaiguan Pass, it had strongly promoted the cultural policies, which absolutely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longevity of Qing's government.

[Key words] Manchuria society; Chinese works; multicultures